



重庆文物考古研究系列

渝东盐史文集

刘卫国 著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市盐业协会 编
云阳盐化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K-3061.01)



科学出版社互联网入口



赛博古二维码

文物考古分社

部门: 010-64010983

部门E-mail: arch@mail.sciencep.com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03-061753-8



9 787030 617538 >

定价: 198.00 元

重庆文物考古研究系列

渝东盐史文集

刘卫国 著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市盐业协会 编

云阳盐化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盐业生产为中心,通过对盐泉利用方式和盐井形态、盐灶形式演变的研究,揭示了渝东盐业生产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梳理了渝东盐业生产形态和生产技术演进的脉络;同时对与盐业相关的盐业政策、交通路线、军事斗争、民风民俗、历史人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以及盐业生产和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渝东盐史文集 / 刘卫国著;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市盐业协会, 云阳盐化有限公司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6

(重庆文物考古研究系列)

ISBN 978-7-03-061753-8

I. ①渝… II. ①刘…②重…③重…④云… III. ①盐业史-重庆市-文集
IV. ①F426.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4497号

责任编辑: 王光明 王 钰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4 插页: 4

字数: 432 000

定价: 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重庆文物考古研究系列”编委会

主 任：刘 旗

副主任：幸 军

委 员：周大庆 熊子华 严小红 侯玉峰

总 编：白九江

副总编：高碧春 袁东山 方 刚 林必忠

考察现实是认识历史的钥匙

——《渝东盐史文集》序

李根蟠^①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盐业史论文集，并非出于专业历史学家之手。作者是盐业战线的实际工作者，主要是退休后才涉足盐史，积十余年而成是书。这在当代中国史学上也算是一件稀罕事了。

他，就是被盐史界亲切地称为“老盐巴”的刘卫国同志。

2003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为《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写了一篇《绪论》。专辑的作者大都是专业的考古学者或盐史学者，唯刘卫国（他在专辑中有两篇文章）的身份比较特殊，算是“票友”吧。这时我们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这年的秋天，刘卫国同志寄来了他的几篇盐史论文，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有视野，尤其是处处流露着他对盐史的热情和执着，令人感佩。我当时在“中国经济史论坛”上安排了他的一个专辑。在这以后，刘卫国同志继续在盐史领域笔耕不辍。最近他告诉我，准备出文集了，要我写几句话为序。刘卫国同志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能结集出版，可喜可贺，他的嘱托我不能推托。不过，我不是做盐业史的，有关专业内容的评价应该由读者和盐史工作者来做，我在这里只能谈谈浏览文集以后所引发的一些感想。

这部文集包括论文19篇，文集以研究渝东地区盐业史为己任。作者以盐业生产为中心，通过对盐泉利用方式和盐井形态、盐灶形式的演变，揭示了渝东盐业生产起源和发展的过程，梳理了渝东盐业生产形态和生产技术演进的脉络。他的研究又拓展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如食盐运销和相关的交通路线、人口迁移、族群之间的争夺和融合、盐业与战争、盐业与政治，以及相关的民风民俗等。文集中还有对历史文物的诠释、对传世文献的解读，以及对特异地理景观的推介等。在这些论述中，自然

^① 李根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

因素也和人为因素、社会因素一样受到关注，地理环境在盐业的起源与发展、在盐业生产形态演进中的重大作用得到比较透彻的说明。研究的时限以古代为主，往上追溯到盐业的起源，往下延伸到近现代。文集中还有研讨当前盐业生产、盐业市场和盐业政策的文章，如对私盐泛滥和盐价双轨制问题的述评，反映了作者殷切的现实关怀。由此可见，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盐史，他的视野相当宽阔。虽然每篇文章都是研究个别的具体问题，但综合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以渝东盐业史为中心，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纵横交错的立体场景。

刘卫国同志关注和参与渝东盐业史研究是有缘由的。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四川井盐生产是由战国晚期秦国李冰开创的，盐井的最初出现则锁定在成都平原，巴渝地区的盐业史长期无人问津。他很早就感到这种论断与实际情况不符，感到历史记载存在着严重的断层。弥补这些断层，复原渝东盐业历史的真相，一直是他的心愿。他一面呼吁专家学者重视渝东盐业史研究，另一方面自己动手写文章“抛砖引玉”，而退休以后使他有了更多写文章的时间。这时适逢巴国史研究在深入进行，而三峡库区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盐史文物，刷新了人们的认识，前人错误的说法得以纠正，井盐史研究拓展到巴渝地区，拓展到战国以前至远古。这是盐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的出版就是这一突破的重要标志。现在，渝东盐业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成果累累。而作者长期的呼吁和研究，对渝东盐史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刘卫国同志没有跨进过大学历史系的门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史学教育，然而他却写出了地道的盐史论著，有些文章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也未必写得出来。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对他所从事的盐业工作的挚爱。他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对盐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盐巴”。年逾花甲，退休了，吃穿不愁，一般人的选择是颐养天年，他却把精力投到这种别人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中。“文章不为稻粱谋”，他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份感情，这种事业心。二是作者知识面较宽，有相当深的文史功底，有利于他的研究，但比起一般史学工作者来说，他真正的优势却在于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对现实的盐业生产和盐业管理的洞悉和熟稔。这种经验和知识来源于长期盐业工作的实践。作者在盐业战线渡过了几十个春秋，从做拽水工开始，到1978年部队转业后长期从事盐业管理工作，使他有机会跑遍渝东的山山水水，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刘卫国同志的盐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知识。

何以现实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成为研究历史的优势？这就涉及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问题。“历史”有二义：一是指过去的事，二是指人们对过去的事的记述或认识。这并非同一事物的两种属性，而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事物。前者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本来的历史”，后者是对客观存在的“本来的历史”的主

观记述或认知，也就是所谓“史学”。两者既不容混淆，也不能割裂。这好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是取得对“历史”科学认识的第一步。

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也是不能混淆和割裂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过往又不断继发的过程。过往的成为历史，继发的更新现实。两者的界线是清楚的。但现实在每一瞬间都过往为历史，历史则在每一瞬间继发为现实。从万事万物发展过程的延续性看，一切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甲骨文史字作“𠂇”，《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记事为史，属于历史的第二义。所记对象的“事”发生的当时是现实，被记录下来已成过往，属于历史的第一义。但“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后浪推前浪的滚滚长河。甲骨文中“史”与“事”同为一字，这本身就蕴含着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的哲理。历史和现实相续相涵。现实之源，现实中许多事物的萌芽状态、初始状态包含在历史中。历史或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包含在现实中，有形可辨，或积淀为现实前进的基石，或形成传统融入社会的俗规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行动中，如气脉之行，无形可辨。总之，历史似乎已经逝去，实际上它还在现实中“活”着。这样，我们就既可以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也可以通过现实认识历史。

如何通过现实认识历史，下面从两个角度予以考察和说明。

其一：现世中的“活”史迹是研究历史的特殊“史料”。

历史是既往的过程，它不能重演，后来的研究者不可能亲历其境，进行实际过程的调查，只能通过某种“中介”进行研究。这种中介首先是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作为研究历史史料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各有其特点和优点，亦各有其不足。我国有门类众多、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其中虽有后来人对前代事的追记，大部分则是当时人对当时事的记载。无论过去或现在，历史文献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但历史文献也有其不足。例如，漫长的远古时代就没有留存下可以利用的文字记载。有了文字记载以后，历史上的事件和过程，包括某些重大的事件和过程，缺载、误载和失载（失传）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传世文献的内容，即使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也不等同于“本来的历史”，而只是“本来的历史”的摹本和影像，属于第二义的历史。由于记录者立场、经历、学养、嗜好、记忆等的差异，其反映客观历史的广度、深度和真实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甚至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因此，对于历史文献，不应盲目信从，而应该抱着对科学存疑的态度，予以分析鉴别。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郑板桥也说：“书到疑处方成悟。”古人研习历史，讲究辨伪和考证。主要方法是用同一作者或不同作者的不同篇章进行比对。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光在文献圈子里打转，有其局限性。历史文物用于历史研究，古代学人偶或为之，形成风气则是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而伴随大量历史文物陆续出土之后。历史文物具有历史文献所没有的实在、直观、形

象的优点，或补文献之缺失，或辨文献之真误。王国维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和“纸上之材料”相印证，传统史学由此开了新生面。但历史文物也有其局限性。古物的出土带有偶然性，历史上重要的遗物能够被发掘出来的永远只有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历史文物总是“残缺不全”的。再者，考古文物的自然形态是一堆散在的不会说话的物，它不会自行讲述人类施加于它的活动，不会讲述它与其他的人与物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人们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相互结合、相互参证的办法来弥补它们各自的不足，除此之外，还常常用得着另一种特殊的“史料”作为参证。这就是以残片、变体或延展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有的表现为实物形态，有的表现为习俗、技艺、谣谚、信仰等，其特点是生动具体而又确实可靠。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是以固态的形式存在的话，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则以活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它是活生生的过程，故具有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弥补固化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地区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遗迹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某些落后的地区和民族保留的习俗，不啻是先进地区和民族某些历史场景生动的再现，它可以增进人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帮助人们解开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中难解的“谜”。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称之为“文证”和“物证”，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史迹就可以称为“活证”。不过现实和历史毕竟是有区别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活的史迹一般不作为直接的史料使用，而用作直接史料的参证。这是一种特殊的史料，是认识历史的特殊中介。这样说丝毫没有降低它在认识历史和复原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考察现实为认识历史提供了“钥匙”。

“钥匙”的提法出自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

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例，说明考察现实对认识历史的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包含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片和因素，一类是过去遗留而未及克服的东西；另一类是过去只是胚芽或征兆而现在获得充分发展的东西。上文说过，这些残片和因素作为研究历史的特殊史料和特殊中介，可以弥补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的不足。但考察现实对认识历史的作用远不止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由此“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本人正是这

样做的。例如，他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攫取剩余价值，以此反观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现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作为剥削制度本质上也是对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只是占有的方式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润；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在奴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这样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考证和复原历史具体事物的层次，是对历史形态整体的把握和本质的揭示。马克思把他的观点凝练成一个生动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说，考察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是认识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社会的关键，马克思把它的作用比作开启历史认识之门的“钥匙”，非同一般。可见虽然这里具体谈的是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意义，但他所阐发的原理对历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

在历史研究中利用仍然“活”在“现世”的前代遗物，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为史学研究指出了重要途径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毛泽东同志提倡研究历史的“古今中外法”，包含了古今相续相含、互证互补的原则，与马克思的“钥匙”说一致。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战国秦汉以后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考察的过程。20世纪末，农史界有的学者提出作为研究历史途径和方法的“考现学”。这些都是马克思关于考察现实是认识历史的“钥匙”理论的应用和实践。我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中曾有所论述。

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后来人比当时人更清楚、更深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事物处于萌芽和初始状态时，不容易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当它们发展到成熟和发达状态时，其性质、特点才能被人们真正认识，这时再反观它们的萌芽和初始状态，就容易理解了。同时，既往的历史虽然已经定格，但它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步地显露出来。后来人研究前代的历史，困难是不能亲历其境以及资料残缺不全。但也有有利条件：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活的历史遗迹可供利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有利于“透视”它的萌芽状态和初始状态；而历史事物的内涵、本质和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得更为充分。这些条件是当时的人不能具备的。所以后来的学者理应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取得比前人更好的成绩。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之一是真正弄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考察和审视历史。

刘卫国同志的盐史研究，是从现实出发，以现实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的。任何研究（包括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刘卫国同志始终立足于现实来认识历史，没有盲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而是以现实情况检验其可靠性和可信度，四川井盐业始于秦末李冰在成都平原开掘盐井的成说

之背离实际，渝东盐业历史长期被遗忘之不合情理，使他产生疑问，形成“心结”。这就是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是他的渝东盐业史全部研究的起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来不但适用于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也适用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刘卫国同志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知识，不但使他能够敏锐地发现以往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使他能够另辟蹊径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以自然盐泉如何向人工盐井演进问题为例，在渝东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他转而对渝东地区400余口古盐井进行长期的观察，把千姿百态、形状各异的盐井区分为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人工井四种基本类型，而这也构成了依次演进的系列。原始井、雏形井、过渡井本质上是盐泉，只有最后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井。他指出，盐井各种类型的形成，与当地特定地理环境有关，而推动其演变的动力却是洪水。这样，他在缺乏可用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为对现实存在的盐井进行类型分析，成功地揭示了渝东地区自然盐泉向人工盐井演进的规律。这在盐史研究中无疑是一种创新。类似的例子在文集中还有不少。

刘卫国同志的这部文集，可以说是“考现”以识古的又一成功的案例，他的实践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考察现实来认识历史，确实是治史的一把金钥匙。

2015年6月于京南枫叶居

壮心不已述鲑海 桑榆未晚霞满天

——《渝东盐史文集》序

程龙刚^①

盐乃圣洁而非凡的晶体，被誉为“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国之大宝”“国之重利”。盐业在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行业。它既供应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又为历代封建王朝提供巨额丰厚的财税。正如民国时期盐务专家曾仰丰所言：

“盐为人人日用所必需，一举箸间，实为财政命脉所系，国家存亡所关。”^②中国食盐的生产和运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广泛的投影，形成了丰厚的积淀。自周秦以来，有关盐的文献史料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上自史传，下迄志书，旁及计臣奏章，私家著述，无不推阐尽致，一若惟盐为足供研究之问题也者”。发掘和整理有关盐的丰富遗产，并予以科学的总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盐业史研究自1909年田斌在《国粹学报》发表《说盐》以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渐向前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盐业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期间以《中国盐政史》（曾仰丰著）、《中国盐政纪要》（林振翰著）、《四川盐政史》（吴炜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盐业史研究的繁荣时期，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盐业史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热点之一，著述颇丰。199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正忠等先生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李根蟠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所说：“盐业史成绩尤著，其巨大发展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四川井盐业生产技术史研究的突破和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榷盐制度的研究，同时亦与四川

^① 程龙刚，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②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自贡井盐历史档案的开发利用分不开。”以四川盐业史为代表的中国井盐史研究取得了尤为显著的成绩，硕果累累，如《中国井盐科技史》（林元雄、宋良曦等著）、《川盐史论》（宋良曦、钟长永著）、《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研究》（刘德林、周志征著）、《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孙建三、黄健等撰述）等。

然而，我们很遗憾地发现，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着重对文献资料的爬梳，认为中国井盐生产的历史始于战国末期李冰开凿广都盐井。显然，盐井成为“飞来”之物，给人们以横空出世之感，中国井盐生产的源起被淹没。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必然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必然遵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规律。由此可见，人类最早发现并加以利用的井矿盐资源，无疑是出露于地表的井矿盐露头——自然盐泉，盐井的开凿正是这种开发和利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井盐生产出现以前，先民早已开发利用便利的自然盐泉。这是中国盐业历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许多研究中国盐业史的专家们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违中国盐业史的‘常识’。然而，从早期盐业开发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角度提出泉盐生产起源问题，恰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常识’。”^①

渝东地区具有自然盐泉从多处流出地面的独特地理环境。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散布于渝东地区的巫溪县宝源山、彭水县郁山镇、奉节县白盐碛、云阳县云安镇、开县温汤井、万州长滩井、忠县谿井和涂井等，自古以来皆有自然盐泉涌出。这些自然盐泉，或从山麓流出，或从溪河旁地面渗出，具有天然性和浅层性的地质特点，较易被先民发现并予以利用，为渝东地区的盐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渝东地区自然也就成为最早开发利用井矿盐资源的发祥地之一。因此，在有信史记载的井盐史之前，还有一段被历史尘封而鲜为人知的自然盐泉的开发利用史。一部先秦时期渝东地区自然盐泉的开发利用史既是一部渝东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史，也是一部井盐生产的幼年史。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这段历史不仅可以回答远自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的“奉节兴隆人”，生活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巫山大溪人”，以至春秋战国末期以前的先民们，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然界生态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在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获取食盐的，而且对研究文献资料阙如的井盐生产有益，又有助于研究渝东地区的民族史。

2000年4月，一位长期工作在盐业战线对盐有着特殊情结的“老盐巴”——刘卫国先生，不辞辛苦，长途跋涉，从重庆万州带着与考古实践经验极为丰富的曾先龙先生联袂撰写的论文《渝东地区古盐业发展史初探：从忠县谿井沟发现原始制盐工具说起》专

① 程龙刚：《三峡地区泉盐生产起源勘测》，《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程来到我工作的《盐业史研究》编辑部投稿，并与我就渝东盐业史和中国井盐生产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说实在的，作为从事盐业史研究和编辑工作的专业人员，我被刘卫国先生对渝东地区盐业史老骥伏枥的热情和执着所深深打动。同时，根据刘卫国先生提供的渝东地区盐业考古最新信息，我敏锐地意识到开垦渝东地区上古盐业史和中国井盐生产起源这块处女地的时机日趋成熟，遂决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大对渝东盐业史研究和弘扬的力度。《渝东地区古盐业发展史初探：从忠县澧井沟发现原始制盐工具说起》在《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上刊发后，在盐业史和考古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盐业史研究》顾问、国际盐史委员会（CIHS）委员（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正忠先生在给曾先龙先生的信中赞誉道：“阁下与刘卫国先生合作的论文，写得很好！值得推荐给更多的人看。”随后，刘卫国先生的大作《试论渝东古盐泉向人工井的演进》在《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发表。2002年5月，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渝东盐业史，抢在三峡库区175米蓄水之前，由刘卫国先生牵线搭桥并兼任向导和讲解，在重庆市盐务管理局肖楠先生及重庆市盐业总公司万州公司毕人忠先生、陆荣华先生等的热心帮助和倾力安排下，我和《盐业史研究》编辑部的林建宇先生、周聪女士赴渝东地区古盐业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在为期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跟随刘卫国先生，跋山涉水，行程数千公里，走遍了渝东地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考察的沿途，粗犷而精美的各型制盐陶器，数量众多、形状不一的古盐井，保存完整、独具特色的古盐场，以及在悬崖峭壁上的输卤古栈道遗迹都令我惊叹不已，渝东先民在盐业生产上的伟大创造和聪明才智也令我深深折服。同年12月，我执笔撰写的《渝东地区古盐业遗址考察报告》刊载于《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4期。然而，与我感受和触摸到的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渝东盐业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渝东盐业史研究特别是文献资料缺乏的先秦时期的渝东盐业史研究成果极其匮乏。我不禁为渝东盐业史“养在深闺少人识”而深感遗憾。带着从事盐业史研究和编辑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挖掘和弘扬渝东悠久的盐业历史，在考察过程中，我和参与此次考察的李水城、孙华、孙智彬、任桂园和陈伯桢等专家学者达成共识——编辑出版一期以全面、系统反映渝东盐业考古进展和研究为主的《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2003年3月，《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盐业史研究》创刊以来第一次出版发行专辑。四川是中国井盐的发祥地。四川盐业史特别是川西、川南、川北盐业史，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具的特色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然而，同样作为中国井盐发祥地的四川盆地东部（即今重庆市），在以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足够重视，科研成果极为缺乏。乃至提及中国井盐的成就与辉煌时，人们只知川西、川南、川北，而不知川东。《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刊载的17篇文章第一次聚焦渝东地区，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考古与“考现”相结合，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渝东地区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盐业历史。它的出版发行，不仅会进一步推动渝东盐业史研究，而且填补了中国井盐史研究的空白。《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的顺利面世，刘卫国先生功不可没。他为《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的稿件和经费奔走呼吁、建言献策，并在此专辑上发表了两篇质量较高的论文——《从忠县涂井溪的古盐泉看人工井的早期演进》和《宁河古栈道遗址新探》。

从这以后，刘卫国先生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在渝东盐业史研究领域忘我探索，潜心钻研，深耕细作，佳作迭出，《奉节鱼复浦上的八阵图与盐灶》（《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渝东古盐业探源》（《盐业史研究》2004年第3期）、《渝东古盐灶向现代真空制盐技术的演进》（《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渝东古盐泉奇景探秘》（《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1期）、《渝东盐业与古代战争》（《盐业史研究》2014年第4期）等一批研究成果陆续在《盐业史研究》上刊载，还有几篇论文分别在《盐文化论丛》和《四川理工学院学报》上发表，成为渝东盐业史研究较为有影响力的开拓者之一。我很荣幸，我是刘卫国先生研究成果的第一位读者！每当他撰写完成一篇大作时，刘卫国先生都将其传给我，嘱托我“把关”。然后，我以打电话或发邮件的形式向刘卫国先生“交卷”——交流“读后感”。在这个过程，我受益匪浅，向刘卫国先生学到了诸多做学问的实用方法和创新精神，同时被他的研究所深深吸引，亦撰写了几篇有关渝东盐业史方面的拙稿，算是向刘卫国先生讨教的“心得体会”吧。

2015年7月，我接到了刘卫国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的那头满怀兴奋地告诉我他即将出版论文集——《渝东盐史文集》，我在电话的这头也是万分激动。紧接着，刘卫国先生把他发表在《盐业史研究》和其他刊物的19篇研究成果和2篇附录传给了我，嘱托我写序。我悉心地拜阅完刘卫国先生传来的书稿后，掩卷“有味”，再次被深深地触动，感佩之情油然而生，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壮心不已述嵎海，砥砺奋进谱华章。他涉足盐业史研究已届退休年龄，本应回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却“自找苦吃”“无病自炙”。15年前，与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刘卫国先生从重庆市万州区盐务管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是仅念过小学加一年军校的他却放不下与盐的不解之缘，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挖掘和弘扬渝东盐业历史文化的新岗位。于是，刘卫国先生凭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和辛勤付出，一头钻进“故纸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同时走遍渝东地区所有与盐业有关的遗址和现场，加之数十年从事盐业工作的经验和感悟，独辟蹊径，不落窠臼，撰写和发表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这令许多专门从事史学工作的青年学者都难以企及，啧啧称赞。第二，系统全面惠学林，桑榆未晚霞满天。刘卫国先生这部力作《渝东盐史文集》内容丰富，系统全面，不但以盐业生产为中

心，而且旁及盐业运销、缉私和税收；不仅论述了盐业经济，还涉及与盐业有关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此，《渝东盐史文集》全方位地展示了渝东盐业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厚重的历史积淀，是研究渝东盐业史乃至中国井盐史不可多得的读物。

谨此为序。

2015年12月于西秦会馆

前言

盐在人类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个人的终生伴侣，无时无刻不在参与我们生命的运转。在人类早期的狩猎—采集阶段，人们尚可从动物的血肉中获取盐分，但进入到农业社会以后，由于谷物类食品成为人类主食，这就需要在食品中添加额外的盐，盐业也就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手工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盐业逐渐对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广泛联系和重要影响。

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电站的建设过程中，中国的文物保护机构也同时开展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三峡考古，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遗址和遗物，向人们展现了长江上游三峡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区域的文明发展进程中，盐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与四川盆地的文明演进过程密不可分，对于深入探讨巴蜀文明起源和发展、早期国家的形成模式、三峡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跨区域文化交流与互动等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盐业考古是近年来新兴的考古分支，它是指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古代食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渝东三峡地区是中国盐业考古的兴起之地，先后发掘了重庆忠县中坝遗址、云安盐场遗址等重要的盐业遗址，其中尤以中坝遗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在中外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中国早期陶器制盐的技术细节揭露出来，也将中国人工制盐的历史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晚期盐业考古研究中，虽然文献记载丰富，但相关工作开展不多，是中国盐业考古研究中有待加强的部分。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古代盐业生产的重要地区，不仅保留有早期盐业遗址，而且晚期盐业遗存也十分丰富。近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加强了晚期盐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以渝东南地区的彭水县郁山镇为重点突破，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先后发掘了中井坝盐业遗址、郁山盐厂遗址，发现了中国目前保存最好的明清至近现代的制盐作坊遗址，该遗址是中国晚期井盐生产的典型代表，为研究重庆地区晚期盐业考古、盐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了深入、持续地盐业考古研究，并将盐业考古拓展为院内重要科研领域。

刘卫国先生是一位资深的盐业工作者，曾先后担任云阳盐厂厂长、万州盐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盐业系统的耕耘中，积累了丰富的盐业生产和管理经